



近日多家媒体刊发了《177学子为投毒者求情》的报道,讲述复旦大学177名学生给上海高院写求情信为“复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求情“免死”一事,引起社会各界热议。它迅速导致两种观点交锋——一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举动,也是舆论的一部分;另一种则痛斥“求情”是非不分,触犯了文明底线。

面对公众对复旦学子的争议及指责,近日,记者独家采访了“求情信”的倡导者——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百三。

记者经过多方采访求证,了解到这封“求情信”的出炉内情。今年3月,林森浩之前帮助过的学弟学妹和林父共同找到律师咨询,在律师的建议下,由学生执笔写了这份“求情信”。随后,学生们又找到了谢百三,希望由他倡导。在学生和老师的共同参与下,才有了“177名学生联名上书”事件。



177学子为复旦投毒者求情引争议 记者采访参与的学生、教授及律师 —— 为投毒者求情过程揭秘

求情信·出炉

律师建议 老师倡导 学生参与

记者从“求情信”及“声明”上落款的时间可以看出,“求情信”寄出的时间是今年4月,也是一审“死刑”宣判后不久。

“一审判决刚出来时,林森浩的父亲和同学(医学院的学弟学妹)来咨询过我,并问我愿不愿意做林森浩二审的辩护人。”上海律师严义明告诉记者。

严律师向前来咨询的林父及同学提出了部分建议,这些建议当中包括“不能让同学写一封求情信”,让林的家人、同

学和被害人黄洋的父亲沟通,尽最大努力求得他的谅解。

“同学们觉得这些建议他们能做的一定去做。”严义明说,之后,这些同学把写好的东西(求情信)拿给他“过目”。

“因为这信是同学们最真实的心理反映,看了以后我觉得原则上没有大问题,我就一个字也没有改。”严义明说。

林的同学找严律师时反复强调,以他们对林的了解,他平时并不是一个很歹毒

的人。严义明律师说,这些同学都是林森浩的学弟学妹,对“学哥”发生这样的事,有一些个人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林森浩平时在学业上,能帮助他们的也是愿意帮助他们的。

之后,这些同学又找到了复旦大学的谢百三教授。为此,谢教授也找复旦大学的领导谈话。现在(复旦大学的)领导们都非常为难,严义明介绍道。

签名者·学生

部分同学在谢百三金融课后签名

记者13日再次联系到这封求情信的执笔者,采访要求被婉拒。但从其他几位同学的描述中,记者还原了学生签名的过程。

“签名的同学基本上都不认识林、黄二人,更谈不上和他们二人有私交了,包括我也不认识他们,应该说本来是案件的局外人,但作为复旦的师生,我们对此事是关心的。”谢百三说。

“签名的同学都不认识林、黄二人”一说,记者从多位签名学生那里得到了证实。

“没有人去特意组织过,我现在只想说‘真的都是自愿的,别的不想多说了’。”上午一位参与签名的同学告诉记者。

“我选了谢老师(谢百三)的金融课,上课的教室里有几百人。上完课后,谢老师就说了一下这个事情,并告诉同学有自己愿意签名的下课来签一下,完全是自愿的。”小张同学告诉记者。

“当时谢老师还说了,有谁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小张同学强调,自己是2013年才进的复旦大学,和林森浩没有接触过。“我也是通过谢老师的金融课知道这件事(求情信)的,但之前对‘投毒’事件也有所了解。”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学说。

随后,经过同学和老师的口头传播,知道这件事(写求情信)的同学越来越多,参与的同学也越来越多。最后收到了177

位学生的签名,才有了“联名上书”一事。多数学生都是在谢老师的金融课后签的名,大家对此事情都比较关注。

“我们很多同学都想为黄洋父母做些什么,包括组织捐款什么的,我们并不是单方面想为林森浩开脱。事前也想到做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理解,但还是做了。”一位同学明确告诉记者。

针对求情信,黄洋的父亲黄国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学生的做法“太幼稚”,并要求政府一定严判(林森浩),判处死刑。

“杀人偿命”是黄国强眼中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港立法会议事 市民亦可参与

设公众席接受预约 普通市民可提交书面建议

香港立法会工务小组13日上午审议扩建将军澳堆填区及兴建石鼓洲焚化炉的“一堆一炉”方案,原本预料13日表决,但却由于坐在公众席上的市民和团体一直抗议,令会议一度暂停;

12日,立法会在讨论发展新界东北的议案时,由于需迁拆“长者村”中16所安老院舍,受影响的长者也亲临立法会会议大厅向港府负责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亲口表达其“不迁不拆”的意愿。

可是,这些请愿者都是如何得以进入如此庄严立法会的会议大厅的?

每周开门会议 供公众旁听

除了亲自表达意见、提交建议书,聆听也是一种参与和关注的最好方式。香港立法会每周都会有不少开放性的会议供公众参与旁听。

据立法会秘书处介绍,立法会会议厅里的公众席的座位在有关会议举行前的两星期开始接受公众人士预约。已预约的市民,须在预约的时间15分钟内报到,按照规定向立法会秘书处的保安人员出示身份证明文件(例如身份证、旅行证件),以办理登记手续即可。

公众在旁听时也必须遵守规定,不得扰乱会议程序。

13日,在立法会工务小组继续审议扩建将军澳堆填区及兴建石鼓洲焚化炉的“一堆一炉”的方案期间,就有不少团体和市民通过登记来到公众席聆听参与会议。可在审议方案期间,有反对议案的市民却于立法会公众席上抗议及喧哗,最终被要求离场,会议一度暂停45分钟,并改用另一个会议室进行。

会议再进行时,香港立法会主席则根据立法会《行政指令》中的条例,不让曾经喧哗的市民再进入公众席。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不定期邀请 公众参与

其实,香港的立法会上不单只有立法会议员和港府官员,除了刚才提到的市民、长者和团体外,去年更有8位露宿者来到立法会现场,直面港府官员,“现身说法”表达自己的诉求。

香港立法会认为,仅靠70位议员来负责制定、修改、审核全港的法律法规及对港府众多部门的工作提出质询,当然是有限的。立法会的官方网站,五大链接项目中的一项就为“公众参与”,当中第一项就是“邀请各界提交意见书”的专栏。

正如香港特首梁振英所说:港府一直十分重视和香港各地区市民的直接对话,希望能更集中和有系统地聆听“民间智慧”。

香港立法会辖下的委员会会根据每周不同的议会主题,向公众人士发出邀请,听取公众人士就有关议题的意见及建议。有兴趣的市民和公众可以把意见书送交与议题有关的小组委员会秘书处。

如果有市民和团体,有意向小组委员会在会议进行当日进行口头陈述意见的,只需按

参与者·教授

只想做善事不想被大家误解

“复旦大学177名学生联名上书”引发的热议连日来一直没有停止。

《环球时报》刊发《复旦学子有权表达对“死立决”的态度》的评论文章表示,复旦学子有权发出他们的呼声。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有一定的合情因素,也是舆论的一部分。

《光明日报》“光明时评”发表评论指出,复旦学子的同情心用错了地方。如果同情心是非不分正邪不辨,就会沦为邪恶的帮凶。他们的求情信,让人万分遗憾。

面对“上书举动”的争议及指责,13日,谢百三发表声明表示:“这件事,177名同学和我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有什么

名利可图呢。”他再三强调,这封信上的签名人完全是自愿的,法学院、医学院同学他自己绝大部分都不认识。“我开始一直不愿出头,不想引起人们的误解。”谢百三在声明中解释说,“我是一个非法学院和医学院的老师,参与此事有点不伦不类和唐突,只想做件善事。”

记者了解到,签字的很多学生也并不认识黄洋、林森浩二人。谢百三告诉记者,“177名同学自愿签名已说明了一切。这些同学都很优秀,也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正如学校发言人所说,这是他们的公民权利。”谢百三坦言,对于这件事,其实他们发出的只是一种声音,对此,法学界

也存在不小的争议。事情的结果还要看上海市高院二审的公正判决。

另外,谢百三透露,事发后,学校曾为黄洋的家里组织过多次捐款。老师、同学、校友们都踊跃参加了,但捐款的具体数额一直是“保密”状态。谢百三认为,这个具体的数额应该由黄洋的家属或代理律师公开,这样才对得住“献出爱心的所有人”。

“我真想为黄洋家里做些什么,也找了很多企业家想让他们帮助黄洋家里,可很多人也想知道复旦师生现在捐款的情况。”谢百三向记者表示。

当事人·对话

谢百三:经过再三考虑才站出来

记者:您同情林森浩吗?

谢百三:首先,我对黄洋同学的遭遇及其家人很同情。但是对嫌疑人林森浩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话,我觉得有些不妥。

记者:您为什么会想着去做这件事?

谢百三:我当时就问找我的那些同学们,“你们怎么会这么同情他(林森浩)?”他们说他们都是认为“林不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啊”,而且还列举了一些林森浩平时的行为。他们多次找到我,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再三考虑,我才觉得我应该站出来。

记者:是学生先找您的?

谢百三:是的。医学院的6个学生代表来找我,3个男生3个女生。他们说林森浩是他们上一级的师兄,曾经给过他们很多帮助。尤其是3个女生,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了。

记者: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

谢百三:对被害人黄洋的家人我们要帮,对林森浩要按照法律行事。林森浩的罪行有几种可能,一种是故意杀人,一种是过失杀人,还有就是间接故意杀人。面临的刑罚是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等,现在的一审结果是林被判了一个最重的。

记者:复旦大学领导知道您做的这件事吗?

谢百三:我跟领导谈过,领导也觉得很难,说领导现在不好出面。学校怕对受害者家属造成再次伤害,因为目前学校与黄家人的赔偿问题还没有谈妥。

记者:您了解的林森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谢百三:他性格很内向,不善于表达,不喜形于色。

他家里很穷,妈妈也重病在身。(投毒案未发生之前,)听他同学说,他妈妈得了癌症,为了妈妈的病,全家人坐旁边哭,他(林森浩)只是在旁边低着头,可以看出他也很难过,但他就是不说话。